



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普书贞 崔迎春 何小平

[摘要]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关键词] 日本社会; 秩序; 耻感文化; 影响

DOI:10.13240/j.cnki.caujsse.20150612.006

秩序的原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是“无序”的相对面。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的增补版《现代汉语词典》对秩序的解释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本文所言日本社会的秩序,主要是指日本普通民众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日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表现的各种秩序现象。

一、日本社会的秩序现象

“耻”在中国儒家的人格主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观。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在外力作用下实现了自身文化内涵的突变之后形成的。

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东北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里氏9级地震,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都有明显震感(以下简称“3·11大地震”)。此次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15882人死亡,2668人失踪,6148人受伤^[1]。地震和海啸造成的东京电力供应中断使得首都东京和东北部地区电车被迫停运。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日本民众表现出超常的冷静。当天下午和夜晚的东京街头,数百万上班族不得不步行回家。大大小小的电车站和汽车站、人行道上依然是秩序井然的人群。

日本民众在“3·11大地震”之后向世人展示了“守法、理性、低调、温驯”的国民素质。大灾过后的最初几天,日本东北地区部分灾民饥寒交迫,即便是在避难场所也缺乏足够多的食物和御寒衣

[收稿日期] 2014-10-24

[作者简介] 普书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邮编:100083;
崔迎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何小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教授。

物,大人和孩子在默默地等待政府的救援,却极少埋怨。地震灾区并没有发生社会混乱和打砸抢事件,也没有专门调遣警察维持社会秩序,社会治安总体情况依然如灾前。

不少学者分析日本现代社会在大灾大难面前的秩序现象是和日本民众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的“避难训练”有关。我们通过在日生活体验和对日本社会的长期观察与分析,认为:日本民众在灾难面前的井然有序和长期训练出来的“第二本能”固然有一定的必然关系,但“避难训练”并不是影响日本整个社会保持良好秩序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因为现代日本社会的文明秩序现象,不仅从日本民众临危不乱的秩序上可以验证,即使在平时的超市购物、车站候车、垃圾分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得到考证。

在日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去做同一件事情,无论队伍多长,老百姓肯定会规规矩矩地排队,一般不会有人上前插队,因为那会令人不耻。“3·11大地震”造成东京电力公司福岛核电站出现安全事故后,电力不足迫使电力公司采取限电措施,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抱怨,而是听从政府的号召,采取减少照明、错开用电高峰等各种方法,积极节电。“3·11大地震”当天,手机信号不畅,公用电话就立即变成了免费电话,大家在电话亭外排队等候,轮到自己时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打完电话,以便排队的人都能尽快给家人报上平安。

日本社会的犯罪率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在日本,小偷小摸或者顺手牵羊拿别人东西的事情很少发生。如果你丢了东西,只要还记得遗忘的地方,一般回去都能找得到。在日本大街小巷散步,很难看见哪栋居民楼或别墅安装了防盗门或防盗窗,许多所谓的“围墙”是竹子或不锈钢栅栏式的,一般很矮,只能用于一家与另一家的界限表示,根本就防不了盗。路上行人以及部分年轻人的钱包就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一大截露在外面,也没有谁会专门把背包放在自己的前面以防盗。在日本不用担心遇到假币,营业员收钱和找钱,几乎没有谁专门去看钱的真假,也很难在普通的商店见到专门验钞机。日本国内一旦有杀人事件或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就马上成为当天的热点新闻在电视台播报。通常情况下,记者就在事故现场和事故发生地行政所辖的警察署门口进行现场直播报道。随后几天各家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及时追踪,传递案情侦破的进展情况,直到案情有明显进展或者被更大的新闻热点所取代为止。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对于公安部门侦破案件和处理事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社会压力,不可否认这是日本警察认真办案执法,不敢懈怠的原因之一。

我们分析认为,现代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

二、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原因

所谓“耻感文化”是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而言的。“耻感文化”就是一种在意别人目光的文化,“罪感文化”是一种在意神明目光的文化。日本社会属于“耻感文化”的概念首先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在其《菊与刀》一书中提出,该书的日译本于1948年出版,销售量达到200多万部,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书籍之一。1944年6月,美国政府特派本尼迪克特研究当时在美的日本战俘,希望她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研究、说明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以制定战后对日计划。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主要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其心理特征,同时对比考察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之后得出日本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而属于“耻文化”体系^[2-3]。虽然当时

有很多人质疑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日本属于“耻感文化”的说法,但是,后来不少学者也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方国家都属于“耻文化”体系^[4-5]。“耻感文化”的形成在日本是经过漫长的岁月培育起来的,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文化。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和法家都非常强调“知耻”的重要性。儒家的“五伦四德”,法家的“八经四维”,分别代表着道德哲学体系及其传统中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两大理论走向。无论在儒家还是法家的道德体系中,“耻感”都历史和逻辑地具有基础性的哲学地位^[6]。

“耻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儒家文化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强调构建德治的社会,而这种“道德”与“德治”都是与个人羞耻感紧密关联的,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耻文化的论述可以说比比皆是。体现儒家思想大成的《论语》共有20篇,498章,其中与“耻感”有关的就有58章^[7]。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从他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对“知耻”教育的重视。孔子说“行己有耻”,作为一个人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7]。

在法家的道德体系中,“耻”具有比在儒家道德体系中更高的地位,它不只具有个体德性的道德意义,而且被提升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管子说“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将“耻”提高到“国之四维”之一,即四个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的高度^[6]。“耻”既是底线,也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国家的命运便不是“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灭”,从此国家民族便万劫不复。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将“耻感”这种心理感受加以发掘、升华,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对国人的行为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文化同属于“儒学文化圈”的范畴,日本的“耻”是从中国儒家文化“礼义廉耻”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8]。大约6世纪前后,中国的儒学思想从中国或经朝鲜传到日本。隋朝时,日本派遣很多留学生到中国,旨在直接吸收孔子的思想。此后的唐朝时期,日本又继续派遣很多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9]。但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并不要求儒学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儒学并未能独立地发展。日本的“早期儒学”以“入世”为主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在社会上扬名为特征。

儒学的“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也是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南。宋代的朱子学在日本被认为是正统派理论。到了江户时代,儒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渐渐为日本社会上层阶级所认可,并进入了它在日本的全盛期^[10]。受儒家思想的洗礼,珍惜名誉,重视羞耻的观念逐渐占据了社会意识主导地位,回避羞耻的现象应运而生。“耻”意识从武士阶级渗透到更广范围的“町人阶级”,“耻感文化”也逐渐得到强化和推广,进而成为日本的文化积淀。

(二) 共同体意识的影响

从日本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日本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等四个大岛及其他小岛构成,可耕地少、生活条件恶劣,且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梅雨、冷暖温差大。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日本在早期历史中就孕育了比其他民族更加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共同体意识。

农耕社会的日本,散落的小村落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场所。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资源的有限,村民在建造引水灌溉设施、组织生产的过程中,仅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为了更好地进行

水稻耕作,人们不得不形成了互助劳作的方式,集体在稻田里耕种,集体插秧、灌溉,集体收获,集体参加一年四季举办的各种民俗仪式。对于村民来说,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村落整体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因此,一切都以协调统一行动为准则,维护村落共同体的安宁和睦就是头等大事。

从日本民族结构看,日本自古就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民族,绝大多数是居住生活在狭长列岛上的使用同一语言的大和民族。在航海极不发达的古代,岛国地理环境成为日本的天然屏障,很难成为外族征服的对象。语言和民族的同质性,产生了日本民众共同的信仰,共同的历史回忆,这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在共同体意识下,大家十分注意他人特别是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对自己的行动的评判。由世人来判断自己的行动是否正确,从而来调整自己,免得在别人面前丢丑,这无形中加速了“村八分”这种无形枷锁的产生和固化。所谓“村八分(むらばちぶん)”是起源于江户时代的一种对于不遵守村规和秩序的人进行制裁的惯例,就是村民在“成人礼、结婚、丧事、盖房、火灾、看望病人、水灾、旅行、生育、祭拜法事”等十项活动中,除了“火灾”和“丧事”此“二分”外,其余“八分”活动均不允许被惩罚者参与,也就是八个方面的与其他村民的来往交流以及援助都得不到了^[11-12]。因为“火灾”如果置之不理的话会持续燃烧,尸体如果继续被放置的话会有尸臭产生甚至引发传染病,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被惩罚者家中而村民不予援助,会造成全村的灾难^[13]。

虽然“村八分”并非成文的法规制度,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乡村惯例,但作为一种全村都与被惩罚者断绝交往的严厉制裁,其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惊人的。它完全剥夺了一个村民生产、生活的基础,在日本,这比法律更有力。日本是岛国,因此被处罚者,一旦遭受社会谴责,内心便会产生一种羞耻感,当这种羞耻感被无限制地放大,为了消除耻辱,要么去流浪,要么去自杀,没有第三条出路。可以说,在这种共同体意识中形成的“村八分”就是日本“耻感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石。

(三) 等级意识的影响

古代日本参照中国先进的管理制度把皇族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的国民划分为四个等级:武士、农民、匠人、商人。这四个等级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各个等级之间地位、权力也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份是世袭的、固定的。法律甚至对他们衣、食、住、行等都作了明确的等级规定。在这种“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武士地位最高,对其以下三个等级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武士不能从事生产活动,其经济来源完全靠领主的供给,类似于我国战国时代的门客。对上要对自己的领主(大名)负责,大名要向幕府将军负责。每个人要做到各司其职、各守本份、不能僭越。如有僭越就是一种耻辱。而且,这不仅是对被冒犯者的耻辱,对冒犯者同样是一种耻辱^[14]。

“耻感文化”是武士履行职责的一种评价标准,不仅包括对领主的效忠义务,也包括领主对武士的经济供给义务和人格尊重等主仆之间的操作细节问题。如果出现纰漏,就会有一方受辱。在江户时代,统治者还对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作了详尽的规定,要求每一户的户主必须在门口张贴有关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通过这些外在标志的约束力来要求民众依照世袭身份的规定,安于自己的身份,从衣着、食物到可以合法居住的房屋等^[8]。这种外在的约束力也促进了“耻感文化”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等级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社会地位等级差异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日常活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等级秩序自觉自愿的服从和认同。这一点与其战后确立的民主政体和经济大国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人与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后

决定用什么方式说话。如英语的 YOU 这个简单的表示第二人称代词,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就要根据对方的身份和地位进行必要的抉择,要面临用“尊他语”“自谦语”、还是“礼貌语”的问题,因为日语语言体系中存在着这种微妙而复杂的敬语表现。同时,人们在聚会或者落座的时候是坐上位座还是下位座以及落座人之间的先后顺序等都是由很多不成文的关于身份、地位上的规定来决定的,即使在现在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15]。当然,与封建时代源于身份等级制的不平等不同,现代社会里的不平等指的不是法律意义和人格上的不平等,而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乐于遵守的基于实力和权威主义的支配与服从。

现代日本社会里,任何一个集团,或大或小,其内部都有一定的身份阶层秩序。如公司里上级与下级的等级关系不可轻易逾越,同事之间也有先辈与后辈之分;学校里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有指手划脚的权力,就连一般的人际交往圈子里也往往会有“亲分”和“子分”的讲究。所谓“亲分”意即“老大”,是“领袖”级别的存在,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当然还要具备亲和力,而“子分”则是追随者的角色。一个人要想在集团中站稳脚跟,首先必须根据自己的资历准确地判断自己在所属集团里的位置^[16]。等级制度构成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承认等级制度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四) 各种宗教的影响

日本是多宗教国家,神道教、佛教、基督教是其三大宗教。日本社会的多教并存、和平相处是其宗教特点之一。据日本文部科学省^①在2014年3月20日公布的宗教统计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全国信仰神道教的人数约是1亿零93万多人,信仰佛教的约是8513万多人,信仰基督教的约是190多万人,信仰其他各种宗教的约是911万多人,合计达到1亿9710万人之多^[17]。这是日本全国总人口1亿2714多万人的1.5倍左右。

日本原始的神道教是土生土长的源于日本的一种近乎图腾的宗教,其实也是一种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民族信仰。神道教的显著特征就是只重视现世,没有因果报应之说^[16]。神道教的产生是扎根于日本人万物有神灵的意识,古代日本人看到怪异的东西,就视为神灵,加以膜拜,日本有八百万神之说,这些神大都是自然神^[18]。日本全国各地神社、寺庙随处可见,知名神社内焚香祈福的人络绎不绝,但他们参拜的目的不像基督教徒那样是为了寻求同上帝的对话或心灵上的解脱,而是多为祈求生意兴隆、消灾祛病、求学升迁、家庭平安等。

佛教是由印度经过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的外来宗教,佛教的传入发展了日本的民间信仰,丰富了日本文化。佛教原本是一种来世主义的宗教,佛教认为人生极苦,涅槃极乐,经过修行便可断绝烦恼而成佛,到达来世的极乐世界。但是,佛教传入日本以后,不仅没有同化日本人的现世观,反而自身就朝现世利益转化,由否定现世转为积极入世。在日本,和尚可以娶妻生子,也可以喝酒吃肉,完全过普通人的生活。日本僧侣给人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职业,与真正的宗教信仰似乎是脱节的^[16]。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是始于1549年,由西班牙传教士在日本九州的鹿儿岛登陆开始,但由于基督教的教义理念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意识有很大差异,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曲折而又坎坷的过程。至今,日本国民中信仰基督教的仍然较少,不足2%,而且信徒中知识分子和青年为多。但不管怎么说,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构成欧美文化中心的基督教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道德等也逐渐为日本所接受,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圣诞节以及圣诞节前后大规模的商业宣传活动等

① 负责日本全国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央部门。

进入日本寻常生活。

目前,日本社会已经习惯了把喜庆的事情按照神道教的方式办理,而把亲人的葬礼等为死者超度的悲伤事情按照佛教的方式进行,另一方面,选择在教堂按照基督教的结婚仪式举行婚礼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多教并存的社会说明了日本人对神的意识并不是那么强烈。日本人对这种“多重信仰”没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这也充分反映了日本人是一个很注重现实利益的民族,甚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在这样一个没有绝对精神权威主宰的多宗教国家里,人的价值是非标准不是以主体的价值是非标准来衡量,而是以他人的是非标准或世间的议论来衡量。因此,他们十分看重周围人的目光和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凡是不能按照妇孺皆知的善行标准来行事的或不能在各种义务之间保持平衡的人,都将被视为无耻之徒,会遭人唾弃,而对耻辱敏感即知耻的人则被认为是德行高尚的人,并受人尊重^[19]。

三、耻感文化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日本的国土面积小,社会秩序井然,人与人之间礼貌和谐,呈现出比较文明的现象,其主要的原因为就是很多日本人认为“不能做丢人的事情”“人言可畏”。从“隔墙有耳,隔窗有眼”这句谚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人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考虑周围的人如何看待自己,自己的行动被周围的人所左右。日本民族的“耻感文化”特色是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潜意识,这是由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潜意识。如今,日本人认为“耻”不仅仅是道德规范,“耻”是一种美德,“耻感文化”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精髓之一。

(一) 耻感文化是日本道德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

日本的“耻感文化”,与其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相结合,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日本人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多种善行标志、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到偶然性的失误,都是羞耻^[9]。

“耻感文化”对于维持日本社会道德标准不下滑发挥了重要的社会组织功能。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写道“日本人以羞耻感作为原动力。”^[2]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过去,日本武士在借钱时候,亲手递交的欠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如果不能保证偿还,即使在大家面前被人嘲笑也没有关系,这借条就是作为质押的唯一依据^[20]。在当时“士、农、工、商”顺序的等级社会结构中,武士地位最高,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武士一旦被人嘲笑的后果了。显然,害怕被人嘲笑的惶恐不安是一种“耻”意识的体现。

在日本民众的日常行为意识当中,常常认为以他人的判断为基准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大家遵循着同样的规则,互相支持,就能和睦相处,关系融洽;相反,如果无视周围他人的判断,以自己为中心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是有悖常理的。一旦和别人发生摩擦,内心就会感到羞耻。因为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知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这也是人们认为的最高道德标准,只有“知耻”的人才是德行最高的人。日本人最怕的是被别人说“不知耻”,如果被人说“那人不知耻”,这是最大的侮辱^[9]。日本民俗学者宫本常一研究认为,“对于住在村落的人来说,如果成为被人取笑的对象,那是最大的耻辱”。家长怀着非常强烈的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别人面前丢脸的意识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家庭教育,以便自己的孩子养成良好的道德和行为^[20]。

在日本,“知耻之人”被称作道德的人,“耻”是坦白的心,廉洁的心,在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知廉耻”这种心理是约束日本人日常行为的基本道德规范,日本的社会公德熏陶就是在这种“知廉耻”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形成的。

(二) 耻感文化是日本秩序社会形成和应对频发自然灾害的法宝

“耻感文化”的形成是建设秩序社会的法宝之一。日本人在意他人的目光,重视社会秩序,视保护名誉为一言一语的准则。日本民众在公众场合体现的自我约束力量与几百年前幕府制度中武士对“名誉的情义”非常相似。他们认为按社会规定制度行事就是安全的,是对得起自己“名誉”的^[21]。

日本的“耻感文化”是最不能忍受被视为“异类”的。从东京、大阪、横滨等繁华街头秩序井然的景象中,并不能简单评断日本人的文明和素质造就了它。但我们应该承认日本社会有一种束缚个人行为的精神力量——那就是“耻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21]。如今,这种强制力的影响和作用已经演变成工作单位、学校、地区等共同体中,将不守规矩和秩序的人排斥于外的不成文的规定。“会被人耻笑的”,“有损体面”,“不感觉羞耻吗”等等,就是对犯了过失的人,为促使其行为改善而做的最后的规劝。因为日本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耻感文化”的形成使得日本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希望周围的人都对其另眼相看,以免被视为是异类,从而采取与大家步调一致的行动。

目前,狭长的日本列岛居住着1亿2700多万人,日本列岛地震频发,地震引起的火灾和海啸也是随时需要应对的巨大灾害。如果在天灾大难面前,老百姓是惊慌失措、秩序混乱、毫无章法,那么对于农村和城市来说都不啻是一场灭顶之灾。显然,做到了在突发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安定、秩序不乱的话,那么,抗灾救灾工作就将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日本正是依靠现代社会的国家管理措施和民众的“耻感文化”,培养了公民遵守公共秩序的责任感和行为方式,提高了公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从而才把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地降低到最小。

“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得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因为重视他人意见和看法,所以有着对周围用心、对人谦虚、注重协调的优点。日本人特别怕在公共场合出丑,非常害怕自己的丑态被人笑话而脱离集体,这是他们不轻易做破坏秩序事情的最基本情结。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个人意识的不断提高、小家庭的形成和人际关系的淡化,日本人的“耻感文化”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参考文献]

- [1] 日本警察庁緊急災害警備本部. 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の被害状況と警察措置. (2014-5-9). <http://www.npa.go.jp/archive/keibi/biki/higaijokyo.pdf>
- [2] 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 菊と刀——日本文化の型. 長谷川松治, 訳. 東京: 株式会社社会思想社, 1979: 168 - 203
- [3] 鐘幹八郎. 恥と意地——日本人の心理構造. 東京: 講談社現代新書, 1998: 29 - 32
- [4] 庄严. 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的差异——《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读后.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5(4): 29 - 31
- [5] 許蓉. 外国人からみた日本の文化. 崇城大学紀要, 平成24年(3): 121 - 127
- [6] 樊浩. 耻感与道德体系. 道德与文明, 2007(2): 23 - 28
- [7] 张莉.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刍议.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124 - 126
- [8] 沈婉蓉. “耻”文化在日本——浅论日本国民性格之形成.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9(9): 73 - 74

- [9] 闫志章. 试论日本的“耻文化”.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8(9):209-211
- [10] 孙政. 儒家文化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日本研究, 1994(4):66-70
- [11] 井上忠司. 「世間体」の構造——社会心理史への試み. 东京: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1984:46-57
- [12] 王志強. これが日本人だ! 小林さゆり 訳. 東京: パジリコ株式会社 2009:103-107
- [13] 季红. 日本人的“村八分”心理及成因探析.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2(7):394-396
- [14] 李卓. 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7(5):71-75
- [15] 三井加寿恵. 電車の中の居眠りについて——日本人のしつけ意識の考察. 飯山諭叢, 1991(8):215-231
- [16] 王俊英. 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文化性格特征.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2010(9):22-24
- [17] 日本総務省統計局. 平成 25 年度宗教統計調査 全国社寺教会等宗教団体・教師・信者数. (2014-05-23).
<http://www.e-stat.go.jp/SG1/estat/List.do?bid=000001052797&cycode=0>
- [18] 山村明義. 神道と日本人 魂とところの源を探して. 東京: 株式会社新潮社 2011:2-5
- [19] 罗国忠 先世和. 日本人的耻感意识及其根源.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3):39-41
- [20] ジェフリー・ゴラー. 日本人の性格構造とプロパガンダ. 福井七子 訳. 京都: 株式会社ミネルヴァ書房, 2011:44-45.
- [21] 诺敏. 从日本“名誉”与“耻感文化”——看现代日本人自我约束意识. 语文学刊 2011(4):108-111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Order Phenomenon in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hame Culture”

Pu Shuzhen Cui Yingchun He Xiaoping

Abstract The Japanese people have observed very orderly behaviors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when facing unexpected natural disasters. This phenomen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long term and deep rooted influence of “shame culture” among the Japanese people. Embedded down in their moral system as sub consciousness, the concept of “shame” restricts people’s various social behaviors throughout their daily lives. The “shame culture” is actually a cultural element derived from 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but at the same time differs from the sense of Chinese “shame culture”.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shame culture” is due to two reasons: the adaptation of external culture to the na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exertion of external forces on the sudden changes of native mores and traditions. Ther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Japanese “shame culture” is resulted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Japan,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nd the impact of multi religions on the locals. As such,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me culture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the Japanese society.

Key words Japanese society; Order; Shame culture; Impact

(责任编辑: 常 英)